



戊戌启蒙四大家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Big Four of Wu Xu
Enlightenment

魏义霞 著



人民出版社

戊戌启蒙四大家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Big Four of Wu Xu
Enlightment

魏义霞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杜文丽

封面设计:毛 淳 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戊戌启蒙四大家比较研究/魏义霞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5089-5

I. ①戊… II. ①魏… III. ①戊戌变法-历史人物-对比研究
IV. ①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1905 号

戊戌启蒙四大家比较研究

WUXU QIMENG SIDAJIA BIJIAO YANJIU

魏义霞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49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5089-5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序

“登山不愁峻，涉海不愁深”。攀登高山而不怕险峻，蹚水行走而不畏深渊。魏义霞教授在探赜中国哲学历程中，始终坚持着“志鹏举以补天，厥青云而奋羽”的精神。她胸怀鹏鸟高远补天的意志，试图补中国哲学创新之天，即使遭受挫折和艰难，其奋翅高飞之志不变，这是其中国哲学研究获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其所以如此。

一是“为山者基于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千万丈陡峭的高山，是基于一筐筐土和石垒成的，开凿万丈的深井，是从挖掘很浅的坑穴开始的。这是教研中国哲学的基本功，亦是其必经的路径。探索中国哲学必然会通中西古今，有浩如烟海的中西文献需要阅读或钻研，有浩瀚繁多的古今典籍需要求索或研究。穷一生之精力，或再假我五十年，也必须艰难地从“一簣之土”或“三寸之坎”做起。这是对一个人能否终日乾乾、坚持不懈的考验，也是对一个人有否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审察。若碰到困难，受到挫折，便萎靡不振、畏难退缩，则前功尽弃，一事无成。所以要在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上获得成就，就必须具备坚持不懈、坚忍不拔的意志，必须具备终日乾乾、自强不息的精神。

二是“苟怀四方志，万里望风尘”。如果胸怀四方以至世界的意识，从长远的眼光来观望人类的未来，那么立足中国哲学，就可以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贡献。五千年无限璀璨的中华文明，曾是世界文明中一颗最光彩夺目的明珠，近代以来曾一度被云雾所遮蔽，而失去了昔日耀眼的明亮。然而中华文明是座开发不尽的宝库，她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规则，可放之四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是人类共立业、共发达、共富裕的道路；“苟日新、日日新”，“日新之谓盛德”的创新精神，是人类进步发展的不二动力；“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精神，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基本条件；“天地之生，人为贵”，“民贵君轻”，以人民为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人本精神；“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价值理想社会；“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为人处世的伦理道德；“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本、合作共处的外交战略；“以他平他谓之和”的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相互平等、相互信任、相互

尊重,营造和谐世界的理念;“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民爱物”的爱护自然、尊重自然生态的环保思想;“泛爱众”,“兼相爱”人类相爱原理,这是实现世界没有杀人、没有偷盗、没有说谎、没有奸淫的人和天和、人乐天乐、天人共和乐的和合境界。唯有怀抱四方志,才能钩深致远地体认中华文化哲学的神奇魅力,才能孜孜不倦地为发扬中国哲学而奉献自己的生命智慧。

三是“道人所不道,到人所不到”。要说出人所没有说过的话语,要达到人所没有达到的境界。“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唯有创新,才能流传下来。若讲前人所已讲,发前人所已发,便不是洛阳纸贵,而是废纸一张;不是传后无穷,而是立化纸浆。人既怀撰写之心,就不能有“终身不脱依傍二字”,若如此,画虎不成反类狗,这就亵渎了文章,浪费了纸张。撰文应该“文津运周,日新其业”,文章只有灵活运用,追求创新,这就是说文章应出新言去陈言为第一义。如此,中国哲学研究才有价值。

此三者,是魏义霞教授之所以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取得成就的原因所在。

戊戌启蒙四大思想家的比较研究,是魏义霞教授善于体会,终于精微的成果。在当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的哲学思想研究中,或单独研究,或康梁比较,但四人间反复比较、交叉比较、概念比较、分合比较,仍研究不足。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总以为康梁既有师生之谊,思想同处必多。该书却体认为康谭思想“十同八九”,其同是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审视和对宇宙本体的体认,以及其价值观的体现。从对中国文化整体审视来看,康谭认为“百家皆孔子之学”,或称孔学、孔教。以儒家经典为主要依傍文本。他们尊孔子贬老子而与梁启超异趣,梁将诸子百家的孔、老、墨为“三位大圣”,并以孔教之教是教育之教,而非宗教之教。也与章炳麟将诸子百家分为九流十家不同。

从康谭对宇宙本体的体认而言,他们均以仁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和核心价值,建构了近代心体学中的仁学派。他们推崇不忍之心,而与章炳麟独尊法相唯识异。从康谭的价值观而观,他们崇尚平等,以平等为仁学中应有之义,并将平等的实现与吸纳西方自然科学中的以太、电、力相结合,作为通达平等的工具。他们以大同世界为价值理想。然梁启超认为大同主义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相左,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在对中西的体认和会通上,康谭以以太、电、力为我所用,作为论证贯通自己思想体系的工具,既与梁启超、严复宣扬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论和卢梭、孟德斯鸠的社会政治思想相分,亦与章炳麟、孙中山着重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的原子、细胞学说相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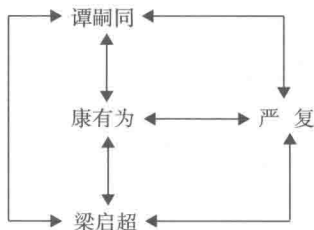
康谭思想既有同,亦有异。中国近代哲学一个核心话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康谭面临中国危机深重、救亡图存成为首要任务之际,康谭却作了不同的选择,康有为凸显其保国、保教、保种三位一体,以保教(孔教)来保国,谭嗣同则认为教不必保亦无可保。并从五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康谭的不同。从康谭梁严四家的异同比较中,可见其尽精微而披沙拣金。

同时,魏义霞教授善于圆融,尽于贯通。在康有为与谭嗣同平等观的比较、康有为与严复宗教观比较、谭嗣同与梁启超无我思想的比较、谭嗣同与严复不可知论比较,以及严复与梁启超启蒙思想比较中,魏义霞教授既能入四家思想之垒,又能出四家思想;既圆融四家思想,又分疏四家思想,高屋建瓴俯仰其理论思维。

就谭梁的无我思想而言,梁曾撰《说无我》,说明无我是佛教思想的核心话题,它是建立在缜密的认识基础上的,是对于人生真相的彻悟。他认为我是无明的渊藪,执著我是产生我爱、我慢、我痴、我见等妄见和偏执的因缘,只有彻悟无我,才能解脱烦恼,而入清静的精神自由境界。谭嗣同认为只有破除我相,才能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而达平等。谭嗣同说:“惟平等然后无我,无我然后无所执而名为诚”。无我是破对待必然条件,才能仁通平等。他们都在对无我的理解和界定中认为肉体之我原本是虚幻的,是假相,轻肉体而重精神。两人的分歧是在于对宇宙本体与致思路径的分别,谭嗣同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由此而推致无我。梁启超作《佛教心理学浅测》对佛教作心理学的分析,彰显心的个体性、主观性。谭梁的致思理路亦异,谭以破对待、人我与华严宗“一多相容”的圆融无碍相和合,梁启超则以五蕴说融合佛教的业报轮回说和进化论的遗传说。谭将无我说为选择庄子思想而推致,梁启超以五蕴说作为无我说的论据。他们都圆融贯通儒释道三教思想,而以“六经注我”的方法,而阐释无我思想,只不过所采取的所重有别而已。

再者,魏义霞教授善于逻辑,尽于结构。在四家思想的纵横比较中,若无严密的逻辑思维就可能失序,若一部专著无序,就是一篇糊涂账,只有按一定的逻辑次序,安排章节,不仅显示作者的掌握思想家思想的能力和水平,而且是作者体认思想家思想深度和分析入理的体现。譬如在分析康、谭、梁、严四人的关系中,随时代的变迁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种关系也在变异之中。严复对康有为思想先批判而后趋同,对梁启超则先切磋而后决绝。特别是对戊戌政变后逃亡海外的康梁,主要在批判。就梁启超来说,在逃亡前,康有为在中学方面影响梁,在西学方面影响梁的是严复,中西相互为用。梁在日本大量接触西学后,与康有异,乃至“康梁学派遂分”。

康谭梁严四人在与时偕行中,会通中西,正如梁启超所说,时尚的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但四人对中西思想的选择、融突有异,康谭以中学为主,严复以西学为主,梁则游离中学与西学之间,构成四人思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基于此,构成四人思想逻辑结构关系如下:



由于其书蕴涵着这样的逻辑结构,使其该书的关系错综而有序,思想复杂而有分。井井有条,环环相扣。

荀子说:“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腿有毛病的鳖,只要不休止地行走,就能达千里之远;只要不停止地累土,就能使小丘成高山。成大业者,都要扎扎实实地从基础做起。魏义霞教授在中国哲学、比较哲学、生存哲学、命运哲学、近代哲学等研究中都有其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的创新,文章不袭前人。相信通过魏义霞教授及其他专攻中国哲学、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女性学者的不懈耕耘,中国哲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花定将绽放出更加鲜艳灿烂的光彩。

当我写这篇序的时候,恰巧北京迎来了第一场久待的春雪,所谓瑞雪兆丰年,祈盼魏义霞教授及中国哲学研究的同仁在今后取得更大的丰收,使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中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具有应有的价值和地位。

是为序。

张立文

甲午年阴历元月初八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康有为与谭嗣同的思想契合	14
第一节 “十同八九”	14
第二节 同在何处	17
第三节 和而不同	23
第四节 同异的后果	29
第三章 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39
第一节 对孔子的定位	39
第二节 对孔教内容的界定	43
第三节 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	48
第四节 孔教是否是宗教	54
第四章 梁启超视界中的康有为	59
第一节 对康有为的整体评价	59
第二节 对康有为思想的阐发	63
第三节 对康有为的历史定位	74
第四节 康有为与梁启超	78
第五章 康有为、梁启超思想比较	95
第一节 孔学与国学	95
第二节 孔教与佛教	107
第三节 世界蓝图与中国策略	119

第六章 严复视界中的康有为	131
第一节 戊戌政变前反对康有为的孔教主张	131
第二节 戊戌政变后反对康有为的政治主张	135
第三节 一战后对康有为思想的同情	137
第七章 康有为、严复宗教观比较	141
第一节 教与学	141
第二节 保教与保国	143
第三节 教与孔教	146
第八章 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	152
第一节 谭嗣同与梁启超的交往和评价	152
第二节 梁启超对谭嗣同其人其学的推崇	156
第三节 梁启超对谭嗣同思想的解读	160
第四节 梁启超与谭嗣同	169
第九章 谭嗣同、梁启超无我思想比较	184
第一节 无我的执著	184
第二节 无我的论证	189
第三节 无我的解脱	194
第四节 无我的分野	199
第十章 谭嗣同、严复不可知论比较	216
第一节 相对主义与感觉主义	216
第二节 人类的感官局限与经验的实证主义	221
第三节 不能不必与“不可思议”	225
第四节 “独任灵魂”与“惟意可知”	228
第五节 不可知论的近代神韵和意蕴	232
第十一章 严复与梁启超的相互评价	235
第一节 严复对梁启超的评价	235
第二节 梁启超对严复的评价	247
第三节 梁启超与严复和康有为	254

第十二章 严复、梁启超启蒙思想比较	263
第一节 权利与道德	263
第二节 民主启蒙与思想启蒙	273
第三节 三民与新民	293
第四节 自由在权利与道德之间	299
参考文献	307

第一章 导 言

1898年的戊戌政变史称“百日维新”，是中国近代重大的政治变革和历史事件。虽然代价惨重，并在极短的时间内以失败告终，但是，戊戌维新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启蒙意义更是不容低估。戊戌变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思维方式、价值诉求和文化理念的变革，而且拉开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帷幕。戊戌启蒙思想家通过重新审视中国本土文化，在对诸子百家的关系和学说的梳理解读、内容转换和理论创新中，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意蕴内涵和时代风尚。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戊戌运动的发动和失败不仅与中国近代的经济、政治、外交状况密切相关，而且与戊戌启蒙思潮密不可分。深入研究戊戌启蒙思潮尤其是作为这一思潮精神导师的戊戌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不仅可以通过回顾、还原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全面把握戊戌启蒙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理论意蕴和价值诉求；而且可以深入理解戊戌启蒙思想内部的分歧，深切感受中国启蒙历程的艰难曲折、迂回复杂。

一、戊戌启蒙思潮

1898年是农历戊戌年。狭义上，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结束，又称“百日维新”；广义上，戊戌变法指发生在戊戌前后、以“百日维新”为核心的维新运动。因此，在通常意义上，戊戌变法或戊戌启蒙至少从1891年康有为发表《新学伪经考》时就已经拉开了帷幕，1895年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发动举子“公车上书”和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论世变之亟》、《辟韩》和《救亡决论》等系列论文标志着戊戌启蒙思潮走向成熟，1898年的戊戌政变更是将戊戌启蒙思潮推向了顶峰。

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一样是影响中国历史深远的重大事件，与这一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并且同样影响深远的则是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即戊戌启蒙思潮。作为舆论准备和理论武器，戊戌启蒙思想为戊戌政变开辟道路，提供辩护。戊戌启蒙思想具有不同以往的政治诉求、思想主旨和时代意蕴，在中国启蒙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和意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人甚至将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定位为中国启蒙思想的开端，其

在中国启蒙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戊戌时期的启蒙思想之所以如此重要,除了一面承接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一面开启革命派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思想之外,还因为其在中国哲学史上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和不容忽视的意义:第一,以中西之辨为核心话题,在中西和合中建构有别于古代的哲学体系。第二,第一次全面审视中国本土文化,梳理诸子百家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学予以整合。第三,在坚守中国本土文化的同时,引进西方文化,通过中西互释,对中国本土文化进行内容更新和转换,推动中国本土文化的变革。第四,无论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诠释还是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均围绕着现实的政治斗争展开,以救亡图存为历史使命和立言宗旨,不仅使哲学拥有了强烈的现实观照和实践维度,而且向国人普及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公德观念。第五,以西学为参照和借鉴,肩负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以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为时代风尚和价值诉求。这表明,戊戌时期的哲学无论在核心话题、基本内容、研究范式、文化理念还是价值旨趣上均发生了重大转换,特色鲜明且意义重大。

戊戌时期的启蒙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阶段特征,具有迥异于其他时期的思想主旨、核心话题、关注焦点和理论特色。例如,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政治斗争、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在启蒙思想中加入了救亡的主题;开始从整体上重新审视中国固有文化,一面反省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一面采取西学加以补救,在创新、改造中坚守中国本土文化,掀起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思潮;中国人对西学的了解不再主要依靠传教士和西方报纸而是开始主动介绍、传播西学,西学开始大量东渐;由于西学的大量东渐,哲学的概念术语、思维方式和价值旨趣发生转变,自由、平等、权利、义务、民主和进化等成为流行语;在输入西方各种思想的同时,以西学为参照并吸收西学的思想要素对中国本土文化进行内容转换,同时尝试着借助西方的学科分类模式对中国固有之学重新予以分类等。所有这些共同证明,戊戌时期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于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是研究中国启蒙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史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

与其地位极不相称的是,学术界对戊戌时期的启蒙思想尤其是对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的关注和研究一直属于最薄弱的环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从先秦诸子、魏晋玄学、宋元明清哲学到现代新儒家逐一倍受关注,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受到热捧。传统文化热目前还在持续升温,由此引发了社会各

界共同参与的国学热。尽管如此,无论是传统文化的持续升温还是如火如荼的国学热均没有推动或带动戊戌启蒙四大家哲学和近代哲学的研究,近代哲学尤其是戊戌时期的哲学思想或戊戌启蒙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有两个原因颇具代表性:第一,戊戌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出版遭遇种种困难,有些至今尚未完全出版。此外,《康有为全集》851万字,并非全集的《梁启超全集》字数更是高达1066万之巨。字数巨大决定了阅读这些文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对于追求快出成果的当代人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第二,不少人认为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缺乏严谨的逻辑论证,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包括戊戌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在内充其量只是古今中外各色学说拼凑起来的大杂烩,既无哲学建构或体系,又无理论深度或创新。有人更是提出包括戊戌时期的中国近代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即使是思想也限于宣传、介绍,远非系统、深入的学术研究。这一认定或评价与戊戌启蒙思想和近代哲学的研究现状之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如果说第一点产生了畏难心理的话,那么,第二点则出于不屑心理。

戊戌时期的思想和哲学和合了古今中外各种学说和思想要素,的确具有新旧交替、杂糅并陈的性质。对于这一点,戊戌启蒙思想家已有清醒的认识,梁启超便将之概括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其实,这种性质恰恰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戊戌思想的启蒙性,也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中国哲学在戊戌时期的转型特征。有鉴于此,可以将中西和合、古今杂糅视为没有体系而缺乏系统论证的缺点,也可以将之视为这一时期的思想、哲学有别于其他时期的独特魅力。换一个角度思考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所在集中体现为问题意识和主题转换。这就是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如何提出解决方案,而在于用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观察宇宙、人生,对待传统文化,开始采取全新的范式研究和建构哲学,从而奠定和开启了中国哲学后续的思维方式、关注焦点和主题话语。在问题意识和开启后续的核心话题方面,戊戌时期的哲学有些类似于先秦哲学。可以看到,戊戌维新之后,不论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者还是现代新儒家在关注焦点、核心话题和哲学观念方面都与近代哲学——特别是戊戌启蒙思想家具有某些内在联系,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下。例如,当今学术界的很多争议如国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儒学是否是宗教以及中国有无封建社会等都离不开这一时期,因为这些话题就是由戊戌启蒙思想家开启的。不了解戊戌启蒙思想家谈起这些话头的初衷和情境,就不明白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现实观

照、政治需要、文化语境和立言宗旨。也正是由于不能从源头处讲起,缺少了追本溯源的环节,上述争议越来越大而很难达成共识。有鉴于此,全面梳理、把握戊戌启蒙思想,回到近代哲学,有助于在还原中国近代特殊的政治格局、历史背景和文化情境的前提下,从话题开始出现的地方弄清楚诸如孔教、宗教、封建社会、国学等一系列范畴、问题的原初含义和缘起。在此基础上,一面加强对这些概念的历史信息的理解和分析,尊重其内涵的确定性;一面透视这些问题的精神实质,从而作出全面、客观、公允的评价。

二、戊戌启蒙四大家

戊戌运动和“百日维新”的舆论准备、思想武器是戊戌时期的启蒙思想,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对于戊戌变法起到了思想鼓动和行为引领的作用。因此,戊戌维新离不开戊戌启蒙思想家,他们是戊戌启蒙的旗帜和导师。说到戊戌变法前后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则非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和严复四人莫属。梁启超曾作文《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以“二大家”称谓作为西方近代文明开山的培根和笛卡尔。借用梁启超的这一话语结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和严复便可以称为中国近代戊戌启蒙思想的“四大家”,简称戊戌启蒙四大家。以戊戌启蒙四大家为主要人物,既可以全面呈现戊戌时期的启蒙思想,又有助于开展近代哲学研究。

如果说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和严复作为主要人物研究近代哲学是一种“选择”的话,那么,以他们作为戊戌启蒙四大家则是“别无选择”。具体地说,近代哲学研究可以选择的人物众多,即使不将王国维等人纳入其中,孙中山、章炳麟显然与谭嗣同、梁启超不分伯仲,甚至在必要性、代表性和影响力上略胜一筹。这是有些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让谭嗣同、梁启超占一章篇幅,而章炳麟、孙中山各自独立成章的原因,也证明了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和严复作为近代哲学四大家带有“选择性”。换言之,这四人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四大家不是必然的,如果非要如此,可能引起争议。对于戊戌启蒙四大家来说,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和严复不仅是最佳人选,而且是“唯一人选”。因此,可以说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和严复是近代哲学研究的主要人物甚至是最佳人选,却不可以说是“唯一人选”;既然不是“唯一人选”,便可选可不选。对于戊戌启蒙四大家来说,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和严复既然是“唯一人选”,便意味着他们是不二人选,故而不得不选——或者说,选择的结果只有这一种可能性。

戊戌启蒙四大家有别于戊戌四大家。戊戌四大家外延较大,涉及的人物范围较广;人物的选择可以指思想方面的,也可以指政治方面的。总之,

举凡戊戌时期对中国政坛、历史或思想具有重大乃至决定影响的人物皆在其中。在这个意义上,戊戌四大家不排除慈禧太后、光绪帝和李鸿章等人,甚至可以说,这些人对戊戌时期中国命运和社会历史的影响显然大于包括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和严复在内的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沿着这个思路,这些帝王将相理应成为戊戌四大家,至少比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或严复等人更有资格成为首选。戊戌启蒙四大家与戊戌四大家的区别在“启蒙”二字上,“启蒙”不仅意指这些人物在戊戌时期对中国有影响,而且具体落在思想启蒙、风气引领上。沿着这个思路,即使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人物,纵然影响在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或严复之上,只要不是思想启蒙者,便不能入选戊戌启蒙四大家。换言之,戊戌启蒙四大家只能在戊戌启蒙思想家之中产生。“启蒙”二字先天地框定了戊戌启蒙四大家是思想概念、文化概念,而决非纯粹的政治概念。戊戌启蒙四大家的基本含义是对戊戌政变有推动作用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排除了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并且是具有思想引领方面作用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排除了光绪帝等支持变法者,而且排除了其他变法的参与者,如除了谭嗣同之外的其他五位“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在“戊戌六君子”中并非排在首位,如果“戊戌六君子”中有一人入选戊戌四大家的话,谭嗣同恐怕要落选。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无论是从康有为还是梁启超的排列来看,最终都轮不到谭嗣同。康有为曾作祭奠六君子的祭文,文曰:“维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三日,乃诰授奉直大夫、河南道监察御史杨公漪川讳深秀,诰授朝议大夫、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杨公叔侨讳锐,诰授朝议大夫、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刘公裴村讳光第,诰授朝议大夫、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林君瞰谷讳旭,诰授朝议大夫、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谭君复生讳嗣同,诰授宣德郎、候选主事亡弟幼博讳广仁六烈士殉难周岁之辰。”^①这是康有为纪念戊戌政变一周年写的,六君子之间的排列顺序是:杨深秀、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和康广仁,谭嗣同排名第五位。在作于二年后的《六哀诗》中,六君子的顺序发生变化,变成了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和康广仁——此时,谭嗣同排名第二。倒数第二和正数第二是康有为两次排名给予谭嗣同在“戊戌六君子”中的位置。梁启超作《戊戌政变记》,回顾戊戌政变的始末,并有六君子传附在其后;六君子传的顺序是,《康广仁传》、《杨深秀传》、《杨锐传》、《林旭传》、《刘光第传》和《谭嗣同传》。一目了然,《谭嗣同传》排在最

^① 《加拿大未洁岛祭六君子文》,《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后,只是文字稍长,与排在首位的《康广仁传》文字相当。对比、分析康有为、梁启超对“戊戌六君子”的排列可以看到,不仅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排列顺序有别,即使是康有为本人的两次排列,顺序也相差很大。康有为两次均将其弟康广仁列于末尾,或许有“谦让”、“谦虚”之意。循着这个逻辑,梁启超将康广仁置于首位,或许有“看在康有为面子上”的人情因素。排除对人情因素的考量,不难发现两人排列的共同点,那就是:杨深秀在谭嗣同之前。据此,似乎杨深秀比谭嗣同更有忝列戊戌四大家的资格。尽管如此,若说到戊戌启蒙四大家,谭嗣同入选则是毫无悬念的,因为谭嗣同启蒙思想家的身份在“戊戌六君子”中是首屈一指的。议论至此,戊戌启蒙四大家非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和严复莫属。

三、戊戌启蒙四大家的关系

在确定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和严复是戊戌启蒙四大家当仁不让的“唯一人选”,戊戌启蒙四大家研究必须以他们作为研究内容之后,四人之间的先后排列顺序随即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诚然,这个问题有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四大家都有明确的生卒年月,按照他们出生的自然顺序排列,即严复(1854—1921),康有为(1858—1927),谭嗣同(1865—1898),梁启超(1873—1929)。问题的关键是,在戊戌启蒙思想或戊戌启蒙四大家研究中,无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还是严复都不是作为“自然人”而是作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启蒙思想家出现的,这决定了不能够将四大家当作“自然人”,依据他们出生的自然时间先后排列顺序,而应该按照历史的逻辑、思想的逻辑,以戊戌启蒙四大家的身份为依据将他们联为一体,作为戊戌启蒙的代表共同呈现戊戌启蒙思想。如果按照四人出生时间的先后排序的话,除了显得僵化、生硬之外,更主要的是使四个人彼此孤立起来,不能更好地呈现戊戌启蒙思想的整体性。因此,有必要在此之外进一步探究其他的排序方法。

戊戌启蒙思想家的称谓,与作为洋务派的李鸿章、张之洞,作为革命派的孙中山、章炳麟和作为新文化运动者的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相区别,侧重的是戊戌启蒙思想和四大家之间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作为戊戌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和严复具有共同关注、开启的核心话题、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这主要反映在如下方面:第一,思想建构以救亡图存为理论初衷和立言宗旨,救亡的口号便是1895年由严复率先喊出的,由此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第二,宣传、介绍西方学说。第三,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等近代价值观念,对三纲展开全面批判。第四,以西学作为参照